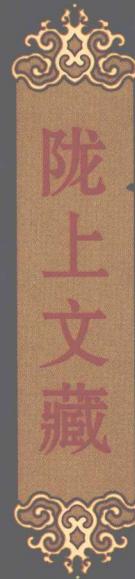


刘醒初 ◎ 主编



邢澍诗文校释

清·邢澍
◎著
漆子扬
◎校释



NLIC2970822497



陇上文藏
刘醒初○主编

邢澍诗文校释

清·邢澍○著
漆子扬○校释



NLIC2970822497



甘肃文化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邢澍诗文校释 / (清) 邢澍著；漆子扬校释. —兰

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11.3

(陇上文藏)

ISBN 978-7-5490-0178-1

I. ①邢… II. ①邢… ②漆… III. ①古典诗歌—诗集—中国—清代②古典散文—散文集—中国—清代 IV.

①I214.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50847 号

邢澍诗文校释

(清) 邢澍 著 漆子扬 校释

责任编辑 / 周乾隆

封面设计 / 苏金虎

出版发行 / 甘肃文化出版社

地 址 / 兰州市曹家巷1号

邮政编码 / 730030

电 话 / 0931-8454870

经 销 / 新华书店

网 址 / www.gswhenhuacn

印 刷 / 甘肃万事佳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厂 址 / 兰州市七里河区南滨河中路405号

开 本 /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字 数 / 375千

印 张 / 19

版 次 / 2011年3月第1版

印 次 / 2011年3月第1次

印 数 / 1—3000册

书 号 / ISBN 978-7-5490-0178-1

定 价 / 88.00元(全2卷)

如发现印装错误，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在甘肃，良好的学术传统源远流长，而中古以来，陇上博雅有士既称多才擅文人之风，也交游至西北四省，名流相为盛举。古时的主要著述如晋唐古国学承前一脉，宋以苏轼、黄庭坚、苏轼、王安石、范仲淹等，王氏的《东坡全集》、苏氏的《东坡全集》、范氏的《范文正公集》，都是后世著录甚广的文学作品。宋词方面，苏轼、辛弃疾、柳永、周邦彦等词人之词作，都是后世著录甚广的文学作品。宋词方面，苏轼、辛弃疾、柳永、周邦彦等词人之词作，都是后世著录甚广的文学作品。

探寻古典，成就未来

甘肃省文史研究馆党组书记 馆长 刘醒初

明清已降，尤其是18世纪末至19世纪中期，甘肃文化名人辈出。自古被目为荒僻的西北边地，涌现了一大批卓立特出的文化大家，他们在历史、哲学、经学等人文领域，以及文学和艺术创作上成绩赫然，极大地振兴了甘肃学界和文坛，并在国内外引起了极大关注和影响。由于历史原因，这些学人的著作或焚毁将绝，或散佚于民间郊野，现亟需予以搜集、挖掘和整理，以保护我省珍贵的文化遗产。

甘肃省文史研究馆是甘肃省人民政府领导下的具有统战性、荣誉性的文史研究单位。自1953年成立以来，聚集了一大批甘肃省内的文化英杰，并在“敬老崇文、尊贤尚德”办馆方针的指导下，秉承拾遗补缺、各展所长、量力而行、尽力而为的原则，一直致力于我省地方文化、历史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工作。当此之时，自当肩负起应有的历史责任，为弘扬全省优秀传统文化做出自己积极的贡献。

鉴于此，为充分挖掘和展示我省丰富的文化底蕴，保护珍贵的历史典籍，更好地配合甘肃“特色文化大省”建设的需要，我馆启动实施了甘肃省《陇上文藏》文史工程项目。《陇上文藏》第一辑以明清至民国期间的甘肃文化巨子为纲，以其代表性学术著作、诗文为主要内容，以搜集、整理、保存为目的。我相信，《陇上文藏》的编纂出版，必将为当今乃至未来的甘肃历史与文化研究、建设拾遗补阙，提供借鉴和助力。

甘肃地域辽阔，自然风光优美，茫茫的戈壁、淳朴的黄土高原、广袤无垠的草原、洁白莹润的冰川共同构成了一幅雄浑壮丽的画卷。生活在这一壮美大地上的甘肃人民，在悠久的历史中，也创造出了璀璨夺目的文明成果。大地湾遗址证明，早在先民



时代，人文始祖伏羲就诞生在渭河上游。三千多年前，周人先祖发祥于陇东一带。汉唐以来，甘肃一直在全国占据着极其重要的位置。作为我国东南部通向西北的交通要道、汉唐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甘肃大地上，镶嵌着上千处人文景观，其中有堪称世界石窟壁画艺术宝库的敦煌莫高窟、万里长城的最西端嘉峪关、以泥塑著称于世的天水麦积山石窟、地下珍藏汉简、金碧辉煌的拉卜楞寺等，无不向世人展示着甘肃乃至华夏文明的强大魅力。

而历代甘肃籍人氏，也以自己的天赋奇才、一腔赤诚，在这块大地上谱写了光辉灿烂的篇章。《陇上文藏》第一辑的编纂出版，虽仅为甘肃文化的涓涓细流，但我相信，随着未来《陇上文藏》的陆续编纂出版，甘肃丰厚的地方文化长卷，将逐一展示其绚烂风采、熠熠光芒！

抚今追昔，感慨万千。探寻古典，成就未来。无数前人和今人的劳动与创造，构建了陇原历史和文化的大厦。先人的文明之光依然在星空中闪烁，今人用自己的创造传承发扬了先祖的精神和光芒。我相信，这一来自文明核心的力量将在今天和未来继续推动陇原文明生生不息，奔腾前行！

谨为序。

编辑式日新月异，出类入萃的文采风流，使中原地区至宋元时期，2011年1月10日

跨入文学全盛时期，宋词的鼎盛，元曲的兴盛，明朝的章机，清朝的繁盛，无不显示着中国文学史上的辉煌，对后世影响深远。宋词以其独特的艺术风格，丰富了中国的文学宝库，被誉为“继唐诗之后的又一文学高峰”，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宋词以其独特的艺术风格，丰富了中国的文学宝库，被誉为“继唐诗之后的又一文学高峰”，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宋词以其独特的艺术风格，丰富了中国的文学宝库，被誉为“继唐诗之后的又一文学高峰”，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宋词以其独特的艺术风格，丰富了中国的文学宝库，被誉为“继唐诗之后的又一文学高峰”，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宋词以其独特的艺术风格，丰富了中国的文学宝库，被誉为“继唐诗之后的又一文学高峰”，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宋词以其独特的艺术风格，丰富了中国的文学宝库，被誉为“继唐诗之后的又一文学高峰”，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宋词以其独特的艺术风格，丰富了中国的文学宝库，被誉为“继唐诗之后的又一文学高峰”，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宋词以其独特的艺术风格，丰富了中国的文学宝库，被誉为“继唐诗之后的又一文学高峰”，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宋词以其独特的艺术风格，丰富了中国的文学宝库，被誉为“继唐诗之后的又一文学高峰”，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宋词以其独特的艺术风格，丰富了中国的文学宝库，被誉为“继唐诗之后的又一文学高峰”，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宋词以其独特的艺术风格，丰富了中国的文学宝库，被誉为“继唐诗之后的又一文学高峰”，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宋词以其独特的艺术风格，丰富了中国的文学宝库，被誉为“继唐诗之后的又一文学高峰”，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章父时，邢澍邀来陈朗子则泉耶校其诗。取其诗去，署先庭采父席其，甲乙丙丁，”邢澍重刻由出卢石口，山南之大都人。前此西林知府刻有刻本，山泉而此最精。五言大才子也。其兄祖系父孙，同刻邢澍诗于表阳。诗集里对子曰：“大才子表禹，小而能治水。山承李节度，甲子年游平山阳。”其二日暮因不得掩，留美官府酒食。用墨笔题诗于壁，酒醉而忘其事，醉后

醉人中也。丁巳年夏月，邢澍衣冠入于京师，见其妻衣上绣李树建的官。身于列祖列宗之下，邢澍著《仰望西庭集》，“出来”始皇碑。同公嘉善寺，有人报讯曰：“五和殿入，高家御史，翰林此坐。邢澍即插腰而笑”。商州志载：“御史台”李西台初就西和殿，御史台长史。御史郎升家擢昇。人丁氏。世祖皇帝品食善计膳奉朝内御西和殿。中书舍人，宣德文部侍郎。邢澍时年四十岁，研读研墨，方得恩典。又至三司，升中书舍人，中书舍人。嘉庆朝，一召于刑部郎中。邢澍即升授刑部郎中。其时人，未尝不以知其人，未尝不以知其人。

序

赵逵夫

邢澍、张澍是清代甘肃最著名的两位学者。邢澍生于乾隆二十四年农历六月二十八(1759年7月22日)，张澍生于乾隆四十一年农历十月初一(1776年11月11日)，邢澍长张澍十七岁。张澍在嘉庆十年(1805)南游，曾在长兴拜访了邢澍，作《留长兴官署三日将返吴门录别邢佺山(澍)明府》五律二首。其第一首当中两联云：“逢君天下士，数我眼中人。观象追甘德(佺山著有《十三经释天》)，寻源说库钩(又著有《两汉希姓录》)。”可见对邢澍学术成就评价之高。张澍又有《题邢佺山(澍)明府桓上草堂图》五古一首，大约也是此次相会所作，时张澍三十岁。其后张澍勤于著述，在文献辑佚和金石学、姓氏学方面有突出的建树，与邢澍的影响不无关系。邢澍、张澍重文献、重考订，倡导实事求是的学风，又重视金石等出土材料和正史之外原始文献的收辑和运用，治学中讲究融会贯通，由微知著，可以说奠定了陇右近代的学术传统。

邢澍字雨民，一字自轩，号佺山，阶州(今陇南市武都区)人，算是我们陇南的先贤。1952年，我姐姐由西和调武都后，我二哥去看望，在地区干校一个房顶上同姐夫、姐姐有一个合影(当时我姐夫在地区干校任副校长)。照片上有两棵树从屋顶穿出，其中一棵主干斜出，我姐夫就坐在那个树干上。武都的很多房屋是平的，用一种软土铺成；捶打结实，可以在屋顶晒粮食、柴草，也可以放上凳子、躺椅坐着晒太阳，夏天可以在屋顶睡觉。甚至可以从这个院的屋顶走到另一个院的屋顶。1955年，我同父亲到武都，住西关(西城外)苗家店，我常在房上看书。有一次走过好几家院落，看到一院庙一样的房子，十多年后才知道那是“家佛殿”，即邢澍写过碑文的“罗氏家



佛殿”。1955年,我和父亲到武都去看姐姐。我对那房顶上的树很感兴趣,和父亲一起到干校去看。武都城北面是山,干校在城外西北角大路边的山上,正当北山棱角处。由西向东沿台阶而上,高处有大门。干校里面有的房子飞檐如殿阁。我父亲说这里先前是龙山寺,也叫龙兴寺,清朝阶州一位很著名的大学者邢澍曾经在这里读过书,解放前武都中学就设在这里。还说到有关邢澍的学问著书之类,当时也不能理解。这算是我第一次听到武都有这么一位了不起的人物。

有的事确实是十分偶然。我于1967年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武都一中工作。当时我姐夫作为食品公司的领导被“揪出”,搬到西城外的“家佛殿”,正当原地区干校(此时已改为“公路总段”的斜对面。家佛殿的正殿坐北向南,地基较高,大殿的正中、两头和两侧的堂屋都住着食品厂的干部、工人。我姐家住的是南房。正殿的西侧有一个巷道,可以通到大殿背后的园子里。就在这巷道里,靠墙倒着一块碑,半截埋在土中,而上部文字可以辨认,正是邢澍所写《罗氏家佛殿记》。当时扫荡传统文化之风正劲,对文物古迹不声张,是最好的办法。我姐家住的屋里就有一尊佛像,她便用纸糊起来,人神共处。她倒不是希望得到神的保护,而是看到面临灭顶之灾的佛爷,觉得可怜,把它保护起来。

20世纪70年代初的“评法批儒”中,我借机读了些诸子的书。读了唐晓文的《柳下跖痛骂孔老二》一书,很有些看法,想写文章驳一下,因为孔子与跖时代并不相及。要找一部《庄子集释》,但一中图书馆、县图书馆都没有,便拜访了郭巨廷先生等,希望在老读书人家中借一部,结果都没有。我也趁此了解有关邢澍的著作、遗迹等。有几个人提到,邢澍从南方回乡时,有四十驮子书(有的说二十驮)。因路途困难,曾沿途赠人,到西安后,将不少书赠送朋友,其中给曾资助他参加乡试的一位商人赠了不少,在天水等地也赠出一些,到武都时有三十几驮(有的说十二驮)。驮回的东西也有他的书稿。武都地势低,比较潮湿,这些书籍、文稿均藏于邢澍婶母娘家蹇家的楼上。蹇家在明清时代为武都大族。蹇来亨为嘉靖甲子举人,先后在四川峨眉、绵竹、渠县有政声,蜀民为之立牌坊。蹇逢泰,善文辞,通天文、地理、医术,曾为汉南教授。民国19年(1930),川军邓锡侯部与马廷贤部回军作战,马廷贤于五月攻占武都,城里人都逃走,蹇家院里驻军队。因院内潮湿,马军将楼上的书从窗中甩下来垫院卧马,书箱作马槽。等军队撤走,书籍纸张与马粪、马溺和成了泥浆。蹇家怕地方上人骂,便堆起来烧掉了。这样,不但邢澍所藏珍贵图书灰飞烟灭,他的未曾刻印的书稿、文稿也一并化为乌有。一中的老教师陈友新说,他小时曾跟着贾师傅到五凤山等处拓过碑,同邢澍的著作有关。安化好像有邢澍写的匾额对联,但具体便说不上了。1973年,父亲到武都来,闲谈中说到“家佛殿”的那块碑,说到了佺山先生,也感慨系之。

“文革”结束后,我考上母校的研究生,又回到兰州。我大学时古代文学课的老



师李鼎文先生向我询及有关佺山先生的资料，并委托我回家时对其卒年和遗著情况作一了解，因为佺山先生的著作多未刻印，返乡之后是否还有著述，也不了解。当时已雨过天晴，一片艳阳，同三年前人们在惊恐中生活，无暇顾及古人、古籍的情形已完全不同。1980年初，我寒假回家拜访了当地一些老先生，并多次拜访佺山先生七世孙邢子仪先生。当时了解到以下几件事：

一、邢子仪先生说，有一幅生前的画像，但是在安化同族人家里。佺山先生祖籍武都安化驼子湾，大约是从南方回乡之后，才搬至县城，居竹集巷，邢子仪所居即其故居。

二、据邢子仪先生说，邢澍卒于道光三年八月八日。

三、樊执敬先生说，邢澍曾在安化驼子湾宗泽庙书匾额一幅，楷书“雨管长调”四字。对联书文天祥两句诗：“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安化的戏台也写有对联，具体内容记不清。

四、关振华先生说，邢澍赴西安参加乡试时，因家中穷困，没有路费，曾摆了一桌酒席，请了地方上一些有名望的绅士，希望资助，但结果吃完都嘴一抹走了。还是一位富商资助了他盘缠。

经我接洽，李鼎文先生同邢子仪先生也通过信。1985年，我的家属调到兰州以后，只到武都去过一次，有关佺山先生的文献，也再未能进行了解。

兰州大学的赵俪生教授1958年曾到西和县参加“大炼钢铁”。那时我还在上中学，全校到青羊峡页水河炼铁。常有人指着赵俪生先生说：“那是兰州大学历史系的教授。”我们都是第一次见到教授，自然从心底有一种崇敬之情。(赵先生在青羊峡还写过一些诗，后来由我转到县上，在《仇池》杂志上刊出)20世纪80年代初我拜访赵先生时，赵先生也曾询及邢澍的有关事情。我觉得佺山先生真是甘肃人的骄傲。

1980年，李鼎文先生撰成《邢澍》一文，刊于《甘肃文艺》1980年第4期，后收入《甘肃古代作家》一书(甘肃人民出版社1982年2月)；赵俪生先生撰《邢澍的生平及其著述》(《甘肃社会科学》1982年第3期)，罗楚南先生撰《滚滚源流万斛才——简介乾嘉国学大师邢澍》(《西北史地》1982年第3期)。一时，邢澍作为甘肃古代杰出的学者与作家，引起更多人的关注。但因邢澍著作流传甚少，真正读其诗文者不多，所以对邢澍的关注热很快也就降下来了。

1990年前后，漆子扬、王锷二同志着手点校冯国瑞先生编的《守雅堂稿辑存》，将其卷二《文集》、卷三《诗集》列为卷一、卷二，于《文集》部分增辑了《金石文字辨异序》和由《长兴县志》辑出之《重建丰乐桥记》等8篇记，共增辑文9篇；将原卷一的《事迹考》《著述考》和卷四《杂俎》作为附录之一，又从《清史稿·文苑传》等辑录7条有关资料，作为附录二，对书中征引文字，也据校好的版本加以核对，改正了明显的错字和俗字，异体字也改为正体，避讳之字也改回为正字。该书经李鼎文先生审订后，列入



西北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主编的《陇右文献丛书》，由甘肃人民出版社于1992年10月出版。这部书的出版，使更多的人读到佺山先生的诗文作品，接触到有关他生平与学术活动的原始资料，为人们阅读和研究邢澍的作品提供了一个较好的文本，进一步扩大了邢澍的影响。

十多年来，漆子扬同志一直致力于邢澍有关资料的搜集工作。1994年至1997年，他攻读硕士学位，即以《邢澍研究》为学位论文。新世纪开始，他一面进行邢澍著作的校释工作，一面继续搜集有关资料，至武都寻访其故居遗迹，专程到浙江嘉兴，访问市、县志办公室和博物馆、档案馆等方面人士，真可谓不遗余力。虽然收获甚微，但也还是有所收获，而且也引起有关方面对邢澍有关资料的重视。今完成《邢澍诗文校释》，对其《邢澍研究》也作了一些修改增订，合为一书出版。

就佺山先生诗文集而言，本书较冯国瑞先生《守雅堂稿辑存》原书及漆子扬、王锷点校本均有所不同。

第一，将《南旋诗草》七十首并单独作一卷（卷一），这更合作者原意。因为《南旋诗草》本为专集，不当与其他诗合为一卷。冯国瑞先生辑本于《南旋诗草》之后附“诗补”，录诗八首，而在其《杂俎》部分并他人的和诗一起，存佺山先生诗《谒谢文靖公墓》等三题八首。子扬同志将此八首从附录部分抽出，又从他处辑得二首，并“诗补”中八首，共十八首，合为一卷（卷二）。因佺山先生之诗除《南旋诗草》外均未刊印，应还有佚诗，设此一卷为将来增辑搭好框架。

第二，将文分为两卷：卷三为考订文字和序跋、书信，属论学术的文字。1992年印本所收之外，又从吴文英编《清代名人手札》甲集辑得《与同年友人书》一篇。卷四为记传之文，也增辑四篇前书未收的文字。

佺山先生在南方二十多年，不仅为官清正，获得很多赞誉，而且学术上取得相当突出的成就，得到钱大昕、章学诚这些国学大师的高度评价和当时很多一流学者的倾慕，然而回阶州之后默默无闻，后代很多人竟不知之，以至于连其藏书、遗稿也弄得片纸无存。我想这主要由于以下四个方面的原因：

一、当时陇南文化相对落后，无人可与论学，“曲高和寡”，知之者少。佺山先生在《武阶备志序》中说：“余尝谓学问之道，博与通相资，而固与陋相踵。吾乡人士患在沿习俗说而不遵信说论。州城外万寿山有南宋人所撰碑，读之可知宋时城郭界址，及河渠迁徙情形。与众人言之，多疑而不信，信者为一二人。”由此可知当时阶州的文化环境。不然，即使藏在蹇家的佺山先生的书稿、手稿烧完了，总还会有其遗著的抄本传世。

二、陇南之地交通不便，一回乡基本上与外地学人联系中断，他的著作难以流通，书也少有人借抄、借阅。

三、当时阶州刻印不便，而且因为缺少知音，大约佺山先生也缺乏刻印的热情，



只是希望藏之高阁，以待盛世，以俟知者。

四、陇南当川甘交界处，是军阀、地方势力争夺之处，土匪也多，所以佺山先生的藏书、遗稿等一并长期封存，未能流传。而不想竟被和于污泥溷水，最后又付之一炬，即使想从中洗认一字一句，也已完全不可能。

佺山先生是杰出的考据学家、金石学家、方志学家。他知道，只要有文字传于后，后代总会有人剖璞见玉，使其光华重现于世。果然，在他去世后一百二十余年即出现了新中国，天下安定，完全消除了军阀和地方势力的混战，消除了匪患，大西北无论在交通还是经济、文化方面都开始发生了巨大变化。尤其在他去世一百五十来年之后的这三十年中，传统文化得到空前的重视。他的著作、他的藏书如留到这个时代，那就成了陇南、甘肃的瑰宝。其实只要他的文稿能留下来，就是一笔宝贵的文化遗产，是甘肃学术研究的思想与精神的资源。但他没有料到竟被处理得那样干干净净，只字无存！这真是一个历史的悲剧。好在佺山先生的东西我们还可以收集起一些来。仅这一些，已经可以看出他学术积累之深厚与眼光之敏锐。

关于佺山先生学术与文学创作上的成就，冯国瑞先生对有关问题进行了详尽的考证。张舜徽先生《清人文集别录》于邢澍《守雅堂稿辑存》云：“澍之治学，博及四部。”并说其遗文一卷，而甚精核。若《两汉希姓录序》，发明考族辨氏之典，所关甚大，实开张澍《姓氏五书》之先；《跋资暇录》考订是书作者实为李匡文而非匡义；《复孙渊如论刘子书》，考订刘子为刘昼而非刘勰，皆足以订《四库提要》之误。《彤管解》一篇，论证古有毛笔，以申毛、郑旧义，而驳宋以来后起之说，皆义据谛当，足成定论。篇帙虽少，而要言不烦。文章之可传与否，本不以多取胜也。陇右乾嘉学者，允推二澍为人伦领袖。张氏少于邢氏二十二岁，此是根据张澍乡试时循俗例所报年龄言之。张氏六世孙张随纯先生家藏介侯公之神主，上书“乾隆四十一年岁次丙申十月初一日亥时生”，则生于1776年11月11日。张澍小邢澍17岁（参李鼎文先生《清史稿张澍传笺证》，刊《甘肃师范大学报》1964年第1期），年辈较晚，所辑《二酉堂丛书》，及自编《养素堂诗文集》校刻精善，卷帙丰盈，故世人知之者为多。其实二澍并以博赡闻于时，皆朴学有文之士，又未容妄为轩轾也，则可为定论。赵俪生先生和李鼎文先生也各有专文进行介绍与评价，全面而精当，漆子扬同志的论文又有全面深入的研究，故这里关于佺山先生的著述、学术成就与创作不准备多说。我要说的是：我们应该从佺山先生留下来的东西里继承些什么。我以为有以下几点应该重视：

一、重视传统文化，重视古代典籍，尤其重视辑存已散佚的古代典籍和金石文字。佺山先生辑《尸子》《孙子》《司马法》《宋会要》等佚书，以期恢复这些古籍之旧，为古代文化的研究打好基础。为什么重视传统文献的整理呢？因为宋元两朝学风浮躁，文人或空谈性命，或以市井小说戏曲为娱，或以八股时文为能，评点之作也多陈词滥调，浮浅套语，缺乏真知灼见。做学问者，都只是以现存的材料为依据，无论说多少



话，多少人撰为论著，都不出常见材料的范围，为学者缺乏深厚的根基。学术的发展依靠两点：一为新材料的发现，二为研究手段的改进与更新。散佚的材料重新辑成，同地下发现新材料一样可以使人们重新认识历史。因当时还没有考古挖掘之说，地下出土文字资料完全是偶然事件。所以佺山先生一着眼于辑佚，二着眼于金石文字。碑版、古铜器铭文为零散存在的书籍，汇集起来，可以解决正史之类书籍不能解决的问题，有些比史书更真实可靠。因此，佺山先生重文献，重辑录散佚的重要文献及金石文字。金石证史，在今日看来有明显的局限性，但在当时实反映着一种比较进步的学术思想，同只在现存书中讨生活者不同。

二、关于山川道里、风物习俗，重视实地考察看验。他在《桓水考》中说：“求之目验而信，证之经文而合。”他将此作为验证学术结论是否能够成立的标准。在《武阶备志序》中又说：“舆地之学，非多阅古今书不能也；阅书多矣，非身履其地，参互考验，仍不能也。”说吴云逵撰《武阶备志》在历时三年成稿若干之后，“迨归故里，又登涉山川，博寻故老，访钟楼于古寺，拓碑碣于荒祠”，对其作法加以充分肯定。今之民俗学与文化人类学家名此为“田野调查”，成为一种全新的研究方法。其实佺山先生继承顾炎武参验耳目闻见以求实证的精神，一直在倡导这种作法。所以，他不同于只在书斋中作学问的学者。他同时也是一位方志学家，实际上也反映了这一点。

三、特别关注陕甘文献。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十四《潏水集》一条云：“嘉庆壬戌重阳后三日，访佺山大令于雉城官署，住宿东斋，于架上得此集，披阅再三，叹其学有本源，非蹈空逞辩者可比。而《宋史》不为列传，其事迹遂无考。”冯国瑞先生《佺山先生事迹考》一文引此，并云：“可知佺山所藏乡贤要籍不少。”此言是也。《武阶备志序》中言藏书三万卷，吴云逵藉之以成《武阶备志》，可知其所藏地方文献之富。其《关右经籍考》《全秦艺文志》都是花很大精力汇辑的陕甘乡邦文献。一则他是甘肃人（清顺治以前兰州以东皆属陕西省），关心乡邦文献，自然是一个重要原因。但从他的一些论著看，并不仅仅因为这个原因。西北乃中国文化之根，周、秦皆发祥于西北而统一全国，则周秦文化之很多难解之谜，当追溯至陕甘一带远古之史方能明白。再向上溯，炎黄皆起于西北，伏羲其人之有无，学者的看法不一，但以历来出土、发现古器物证之，远古之时西北该有较发达之氏族生活，应无疑问。就其当时状况言之，属渔猎时代，则称此时代为伏（庖）羲（牺）时代；一个时代总以氏族为组织，称此氏族为伏羲氏，应无大错；而氏族总有首领，则后人称该氏族之杰出首领为伏羲，亦应该无大错。远古之史渺茫，时代、氏族、氏族首领皆因其特征而符号化乃一般规律。西北为中国文化发祥之地，不容忽视。而自宋代以来，中原及东南一带人文荟萃，都市繁华，西北渐行冷落，终变为荒僻落后之地。佺山先生作为一代杰出学者，也不会不想到这些。从其《跋晋书束皙传》即可看出其巨笔一挥扫除古史研究中附会俗说的气魄。其《两汉希姓录》正是着眼于汉代以前希见的姓氏，由之而考察从先秦时氏族血缘纽带



解体以来姓氏的变化情况。其序中说：古者族系掌于史官，故《周礼》小史定世系，辨昭穆。……《战国策》称“智果别族于太史，为辅氏”。是周末法犹未改欤？汉兴，不复行姓氏之典，公侯子孙失其本系。他列举了东汉应劭《风俗通》以来一些言姓氏者及有关姓氏专书牵强附会、任意攀援，以至交错混乱、前后颠倒的事例。他批评汉代以后氏族、族姓记载混乱的论述，可谓入木三分。其读书之细、之广、之能融会贯通，令人钦佩！文中再三感叹：“乃不胜其舛矣！”“穿凿附会，时或失之，良可慨矣！”“遗编散失，深可惜也！”他抱着正本清源的态度来看待过去的有关论著。

四、学问能融会贯通、以小见大。从佺山先生治学的路子来说，大体上属于浙西派（即张之洞《书目答问》谓“汉学专门经学家”的一派），同浙东派（即张之洞所谓“汉宋兼采经学家”）有别。前者之末流往往至于抱残守缺，后者之末流往往至于疏空浅学。而其卓犖者，皆成一代大师。今所存文如《彤管解》《长兴谢文靖公墓考》《跋王昌龄诗》《跋晋书束皙传》《跋资暇录》《跋李翰蒙求》《又跋李翰蒙求》《跋古文苑》等皆不甚长。最长者《桓江考》一文，也不足两千字，然而解决历来史地家相沿之误，成不易之论。其他论学之书、序更短。然而广征博引、破疑解纷，力可千钧。如《复孙渊如观察论刘子书》，虽至新时期改革开放之后，尚有人著书以证《刘子》为刘勰著，而杨明照先生、郭晋稀师都以为刘昼所作不当疑（海上有人寄书请郭师评，郭师婉拒之，并同我述及其看法，此上世纪80年代初事也）。《彤管解》论先秦之时已有笔，举《鲁语》“臣以死奋笔”、《晋语》“进秉笔”“臣以秉笔事君”、《曲礼》“史载笔”、《尔雅》“不律谓之笔”等例，又引《说文》：“聿，所以书之器也。楚谓之聿，吴谓之不律，燕谓之弗，秦谓之笔。”此皆从文献证之；又说：“《史记》曰：‘孔子作《春秋》，笔则笔，削则削。’明笔与削为两事也。”又引《说文》“著于竹帛曰书”一句说：“竹可刻，帛岂可刻乎？”此从情理方面言之。从而驳历来自蒙恬方有笔之说。而二十多年前出土先秦时毛笔，证明了佺山先生之说的正确。可见，佺山先生治学之严谨与学术结论之可靠。其在《两汉希姓录序》中曾批评前人“昧于古义声音假借之故”，“罔知古字之通”，举例甚多，可见其治学并不同于墨守旧籍强为之说的一流，则浙东学派代表人物之章学诚也对他表现出钦佩之意，不是没有原因的。

五、从《南旋诗草》来看，佺山先生是能诗的。这部诗集时他在嘉庆二十三年秋，自通县乘民船沿运河南归秀水时所作，水路无事，得诗70首。但今存之诗，此之外所见者寥寥。一个可能是忙于政务和著述，于此不甚用心；一个可能是随作随失，不甚措意，也未刻印，因而散失。无论哪一种可能，都可以说明佺山先生处世之态度。他一到长兴，即重修箬溪书院，又修缮文庙，建乡贤祠，以振士风、正民俗，推行教化。他几次捐俸做公益之事，建桥梁，浚渡津，制止伐木烧炭毁坏山林之风，亲撰碑文，立制度以保护环境。尤其建留婴堂收留无人抚养的孤儿、弃婴。又在同善堂（箬溪书院内）设医局与药局，以利百姓医疗。就其作法言之，已与近代一些思想家的设想一致。这些



都非平常人可以做到，也非平常人可以想到。此应为一生佺山先生最看重之处。其次是研究学问，扫历史迷雾，且以端正学风。佺山先生所余东西虽不多，但确可以为做学问的典范。创作可能更在其次。虽然这样，他的诗的散佚，也是甘肃文学史上的一大损失。还有他的《旧雨诗谭》，我以为这是一部论朋友之诗的诗话之作。杜甫《秋述》：“常时车马之客，旧，雨来；今，雨不来（言过去遇雨也来，如今遇雨却不再来了）。”故后人以“旧雨”代指老朋友。如宋代张炎《长亭怨》词：“故何许？浑忘了江南旧雨。”范成大《题请息斋六言》之八：“冷暖旧雨今雨，是非一波万波。”从《旧雨诗谭》应可以窥见佺山先生关于诗歌、关于文学创作的一些看法。可惜今无处可觅。

漆子扬同志在他同王锷同志合作的《守雅堂稿辑存》校点工作的基础上，又在十多年来尽力搜集有关遗作与有关佺山先生生平的资料，完成研究论文，又校释其诗文。他的《邢澍研究》，是第一篇以邢澍为研究对象的学位论文，对佺山先生的生平、交友、政绩等进行了全面的考述，对其学术成就、诗歌创作方面的成就，也作了深入的探讨。其中不少地方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又有所推进。今将诗、文的校释稿与其论文合为一书出版。这是目前佺山先生论著的一个最完善的辑校本，又有笺释，便于阅读。书末又附有目前所可搜集到的有关佺山先生生平与著述的资料，也便于进一步研究与了解。

我以为此书的出版，对突现陇人品格、弘扬陇右精神、激励我省学人的钻研与创新精神，对推动甘肃古代作家的研究和精神文明建设，都会有一定的意义。

（作者系甘肃省文史研究馆馆员，西北师范大学文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甘肃省古代文学学会会长）

前言

中国古代的学者总是比纯粹的文学家享有更为理想的政治地位。清代学者的社会地位、政治地位、优雅生活、学术成就,不仅让同时代的文学家垂涎不已,而且成为20世纪50年代之后中国文人梦境中的精神天堂。尤其乾嘉时期,朴学大盛,学术大师群星璀璨。在这灿烂的星河中,甘肃诞生了两位被学界尊为陇右人伦领袖的著名学者邢澍和张澍。他们是清代近三百年陇右文学和学术的双子星座。民国初年甘肃警察厅代理厅长、甘谷人田骏丰,自号二澍,传为学界佳话。

邢澍,字雨民,一字自轩,号佺山、行一,生于乾隆二十四年(1759),约卒于道光十年(1830),清代著名的文献学家、金石学家、诗人、藏书家、书画家。他在当时的文化圣地江南二十余年的学术仕宦生涯,通过和章学诚、钱大昕、洪亮吉、孙星衍、阮元等国学大师的学术交谊、交游唱和,开启了陇右通往关外的文化交流的大门。归里后,沉静寡营,著书自娱,以致卒年也无从确切考知。关于他的著述、诗文创作、政治功绩现综述如下。

一、邢澍著述考录

邢澍鸿才硕学,著述丰富,可考者多达16种,但大多散佚毁坏,不传于世。今按成书时间,逐一考订,以见其学术之风貌。

《全秦艺文志》,计80卷,张廷济《感逝诗·序》、吴修《昭代名人尺牍小传》、支伟成《清代朴学大师列传》等皆题作《全秦艺文志》。《序》系洪亮吉所撰,洪《序》题作《全秦艺文录》。洪《序》曰:“《全秦艺文录》者,吾友阶州邢君澍官浙江长兴县时所著也。以关中自唐宋以来,叠经兵燹,昔贤述作,沦佚者众,复以二年之力,精心搜采,为《全秦艺文录》一书。始自三代,迄于有明,共若干卷。脱稿后,即邮以示余。余读之,叹其搜罗之广博,类例之严整,大致仿历史《艺文志》等书,而参以近人朱检讨彝尊《经籍考》之例,分别门类,条举遗佚。”

洪亮吉看到的《全秦艺文志》应是全本,当时题名《全秦艺文录》,自先秦到元明完整不缺。张廷济《宿鉴止亭呈佺山师》“志补全秦编汉魏”注曰:“师补《全秦艺文志》,已得周秦西汉共五册。”张廷济所见仅前半部分,大概当时正在编撰之中,尚未完稿。王重民先生认为初稿本凡80卷。此书应当有原刊本,今已不存,不知卷数如何。



洪亮吉和支伟成以为此书“以二年之力”完成，似欠妥当。

章学诚《与邢会稽》云：“《全秦艺文》之订，雒君先生行后，未知余绪如何？”大概胡虔（字雒君）曾佐助邢澍在绍兴编订此书。章建议邢澍应“以先定《全秦人物表》为主”。当时邢澍尚在会稽任上，《艺文志》初编时间最迟也应在嘉庆元年（1796）。邢澍于嘉庆四年（1799）修建长兴鉴止亭官署，因此张廷济《宿鉴止亭呈佺山师》一诗写作时间最早也在嘉庆四年秋冬，而且廷济看到的是已编成的两汉以前的部分。所以，从章学诚和张廷济的记述中可以推断，《艺文志》一书的编写至少花了五年时间。洪北江看到的很可能是全书的初稿。

《关右经籍考》，计11卷，《清史稿·艺文志》史部目录类、孙殿起《贩书偶记》、《清史列传》卷73《文苑传》皆记述11卷。孙殿起《贩书偶记》卷8《书目类》：“《关右经籍考》十一卷，阶州邢澍撰，无刻书年月，约乾隆间刊。”孙氏说乾隆年间刊行是不准确的。国家图书馆（原北京图书馆）善本部藏有嘉庆间11卷原刊本6册、11册两种，版本相同，均12行22字，白口，单鱼尾，四周单边。11卷6册本，系郑振铎先生藏本，卷首押“长乐郑振铎西谛藏书”朱文方章，书末押“长乐郑氏藏书之印”朱文方章，封面题“洪亮吉《更生斋甲集三》有邢澍《全秦艺文录叙》，当即为此书作”。陕西省博物馆藏有一抄本，可惜只能看到目录，看不到原卷。北京大学图书馆1989年馆藏目录中有此书，亦11卷，但2004年查阅时，馆藏目录也没有此书。

《关右经籍考》按年代编排，各代又分经史子集四部排列。先著作者，再著流传存佚情况，作者有小传。洪亮吉《更生斋甲集》卷3《全秦艺文录序》就是《关右经籍考》的序。今国家图书馆所藏《关右经籍考》没有洪亮吉的《序》。王重民先生在《中国目录学史·后记》中曾说：《全秦艺文录》“这当是最初的名称，北京图书馆藏有邢澍的《关右经籍考》，为嘉庆间刻本，当是后来改定的名称。初稿本凡80卷，北京图书馆藏本仅存卷1至11，不知刻本共若干卷。”（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上海书店1984年版）

王重民先生认为《全秦艺文录》系初定名称是正确的，但《关右经籍考》疑并非改定名称。大概这部书邢澍是分两次刊行的，先把三代到隋的部分编订刊行，名《关右经籍考》，以别于总集《全秦艺文录》，也就是说《关右经籍考》是《全秦艺文录》的前半部分。

总之，《关右经籍考》是一部较为详备的，关于秦陇学者著述的目录学著作和研究秦陇学术源流不可或缺的重要文献。如果将《关右经籍考》和王烜《甘肃历代文献录》、张维《陇右著作录》、郭汉儒《甘肃文献录》结合地方志中的《艺文志》，编订一部《甘肃历代著作录》，将对促进陇右学术文化的发展产生极其重要的意义。

《寰宇访碑录》，孙星衍、邢澍合撰，共12卷，嘉庆七年（1802）刊，扉页有孙星衍的题签，《序》为孙氏所作。《清史稿·艺文志》列入史部金石类。该书除原刊本外，又收在《平津馆丛书》（嘉庆本、光绪本）《行素草堂金石丛书》《丛书集成初编》《国学基本丛



书》中。孙《序》记述了本书编纂成书的详细过程，并概述了前代金石著作的成败与得失。

《平津馆丛书》本孙《序》云：“昔邵学士晋涵纂书三通馆，檄取海内外石刻，进之内廷，编书以续郑樵《金石略》，录其副本，举以相赠。藏在行笈，廿载有余，中间游学四方，思以目见手摸为之增补。盖尝西游河华，北集神京，东揽三齐，南穷越纽，所至山川城邑、古陵废庙，或有残碑断碣，无不怀墨握管，拓本著题，录入兹编，岁有加益。其足迹不到之处，又值同世通人名士，搜集好异，邮示所获，扩其见闻。若今王少寇昶、钱少詹大昕、翁阁学方纲、冯编修敏昌、阮抚部元、黄司马易、武大令亿、赵明经魏、何文学元锡，皆为此学，借以订正邵书，又增倍蓰。顷归吴下，获交邢明府澍，出以相质。明府博物洽闻，藏书万卷，复据筐箧所有，补其不备，删其重复，乃始成书，刊以问世，题为《寰宇访碑录》。”

孙《序》说明该书的编纂，起于邵晋涵，雏形于孙星衍，经钱大昕、阮元、武亿、何元锡等人的增补，最终由邢澍编订完成，前后经历二十余年。金石学家对该书赞誉有加。中国社科院蔡美彪先生主编的《中国通史》第10册之《金石学》对此书也作了较高评价。

《寰宇访碑录》共收录碑石7706种，每一碑石之下均注明书体、撰者、书者、刻者姓名、年月及碑石所在地。碑石已佚者，皆注明其拓本所藏之处。该书采取详备，范围广阔，收录丰富，体例精严。从碑石、画像、砖瓦、造像到颂、墓志铭、经幢、摩崖均收录不遗，是清中叶关于碑石的一部总结性的目录学经典著作，对后代金石学家影响很大。其后，经过地下发掘和大批学者的探访，金石碑物日益丰富，后人承袭其体类，不断订正补辑。如清人赵之谦有《补寰宇访碑录》5卷、《失编》1卷；近代刘声木有《续补寰宇访碑录》25卷、《寰宇访碑录校勘记》11卷、《补寰宇访碑录校勘记》2卷、《再续寰宇访碑录刊谬》1卷、《刊误》1卷，共计10册，1929年刊刻。郑振铎先生《西谛书话》记述，1956年12月，他从北京隆福寺文奎堂购得刘声木《续补》诸作。罗振玉先生撰有《再续寰宇访碑录》2卷，李宗灏有《寰宇访碑录校勘记》2卷，文素松有《补寰宇访碑录校勘记》1卷。

《长兴县志》，邢澍、钱大昕等纂修，计28卷，嘉庆十年（1805）刊，1972年台湾成文出版公司影印。卷首1卷为邢澍自《序》、《凡例》、《图》、《旧志源流》。其卷目例次如下：卷1《建置沿革》、卷2《城池》、卷3《公署》、卷4《学校》、卷5《兵防》、卷6《田赋》、卷7《户口》、卷8《山》、卷9《水》、卷10《坛庙》、卷11《陵墓》、卷12《古迹》、卷13《寺观》、卷14《风俗》、卷15《物产》、卷16《封爵》、卷17《职官》、卷18《选举》、卷19《名宦》、卷20《人物》、卷21《孝义》、卷22《寓贤》、卷23《烈女》、卷24《释道》、卷25《艺文》、卷26《碑碣》、卷27《杂识》、卷28《辨证》。该书编纂始于嘉庆七年（1802），逾年而志稿成，十年冬刊刻。

据洪焕春《浙江方志考》（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说：南京大学有旧钞本，卷



首有“仁和陆氏潜庵审藏，子孙永宝”朱文长印。该志由钱大昕、钱大昭二人亲定体例，邢澍总纂，金石学家、目录学家瞿木夫协纂，体类精严，向推善本，其卷目分类别部，匠心独运。邢澍认为“金石之流传，犹是当时真迹，未经俗人点窜，读史者往往取决于是，而论舆地者，尤穷心焉”，故将《碑碣》单独立卷，对宋元以前碑石虽佚而文字犹存者，亦备录不遗。该志“信载籍而不信传闻，博考旁稽”，反映了邢澍及乾嘉学派修订方志注重史实的朴实学风。

当时任湖州知府的白善庆撰《序》云：“邢君以名进士起家，闳通淹雅，夙具著作之才，其为吏廉，而能有古循吏风，又适久于其职，悉民最深，顾犹虚心延访，磨以岁月，不甘率略，致蹈简陋。”邢《志》刊于嘉庆十年冬，白《序》作于次年四月，可能在刊行前邢澍曾托白作序，白未能及时撰成，故未收白《序》。这篇《序》后收录在光绪间赵《志》之《旧志源流》中。赵定邦补修《长兴县志》，从体例到选材，基本以邢《志》为蓝本。赵定邦在《凡例》中称赞《邢志》“体例精严，世称善本”。黄莘先生等编著的《方志学》也赞誉邢澍为清代优秀的修志家和方志学家，书后《地方志大事记》且列入了《长兴县志》一书。赵《志》记载：乌程沈登瀛有《邢志订讹》一书，今存1卷，其余散佚。

《金石文字辨异》，计12卷，书前有邢澍自《序》一篇，书尾有何元锡文学《后序》一篇，《清史稿·艺文志》列入经部小学类字书之目。此书除嘉庆十五年(1810)原刊本外，另收在刘世珩《聚学轩丛书》第一集中。

张廷济《瘗鹤铭》诗注记述邢澍著有《金石文录》，即指《金石文字辨异》一书。邢澍自《序》说：《寰宇访碑录》撰成后，发现唐宋以前的金石碑刻由于受篆变为隶、隶变为正楷的影响，运用了大量的异体字、讹字或假借字。“故有同兹一字，其体纠纷，譬一祖异支，几难别夫来者。”于是，邢澍考定金石，论辨文字之异，因枝寻根，酌流求源，辨讹异体而识正体，按《平水韵》编排，于嘉庆十四年(1809)著成《金石文字辨异》12卷。何元锡于嘉庆十五年五月四日作《金石文字辨异后序》。

这部书是《寰宇访碑录》的姊妹篇，是一部具有极高学术价值的金石文字大字典，共收录自汉至宋元单字2498个，凡碑石、砖瓦、墓志铭、经幢、摩崖等所举异文俗字，均收录入编。释文简洁明了，言简意赅。如卷一“辞”条：“《汉尧庙碑》‘将辞帝尧’。案：以辞为祠。”辞，即设庙祭祀。卷四“加”条：“《晋永嘉砖文》‘永加六年’。案：加，即嘉之省。”加，即嘉之省文，与嘉通假。何元锡在《后序》中对该书给予了高度评价。何曰：“是书之成，集腋成裘，因一合十。详时代以定真原，辨岐分以识厥体。譬之问津得要，求异斯同，洵为小学家不可少之书。”近人杨绍廉受该书启发，撰成《金石文字辨异补编》5卷。

《南旋诗草》，计1卷，存诗70首，系嘉庆二十三年(1818)秋，佺山先生自通县乘民船沿运河南归浙江秀水时所作，其中三分之一是和孙竹畦唱和之作。孙竹畦，生平事迹失考。从佺山先生的诗来看，孙氏当生于乾隆六年(1741)左右，扬州人氏，贡生